

文学研究

理论方法与实践

WENXUEYANJIU

LIBUNFANGFAYUSHIJIAN

刘思谦等 著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教学指导用书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教学指导用书

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

刘思谦等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研究: 理论方法与实践/刘思谦等著.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2
ISBN 7-81091-148-1

I. 文… II. 刘… III. 文学研究-方法论-高等
学校-教材 IV.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09242号

责任编辑: 袁喜生

装帧设计: 刘广祥

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 邮编: 475001
电话: 0378-2864669 (行管部) 0378-28250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E-mail: bangong@hupress.com

经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排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印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4年2月第1版 印次 2004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16.25
字数 410千字
印数 1—3000册

ISBN 7-81091-148-1/I·210

定价: 2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学术与良知

——《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序 …………… 耿占春(1)

如何综合

——文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之一 …………… 刘思谦 整理(4)

叙述学：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

——文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之二 …………… 曹禧修 整理(13)

意义：“水晶鞋”与“灰姑娘”

——文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之三 …………… 刘铁群 整理(32)

综合与超越：女性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探讨

——文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之四 …………… 郭 力 整理(50)

性别视角与中国女性文化研究

——阅读《中国女性文化》NO.1 创刊号

…………… 王 萌 整理(84)

以个人名义进入历史书写

——关于李洱长篇小说《花腔》及相关问题的对话

…………… 李仰智 整理(108)

“原型批评的理论与实践”笔谈 …………… 刘思谦 汪振军等(129)

“文学批评的意义阐释与价值论”笔谈	刘思谦	白春超等(160)
“新历史小说与历史诗学”笔谈	刘思谦	傅书华等(188)
“女性新历史小说”笔谈	刘思谦	张兵娟等(217)
“性别与文学”笔谈	刘思谦	王 萌等(250)
“个体生命价值”纵横谈	刘思谦	耿占春等(282)
“历史中的个人”笔谈	刘思谦	王 辉等(333)
智情双结构及其叙事策略		
——《狂人日记》的叙事学阐释	曹禧修	(366)
爱情故事与欲望言说:现代性伦理的个体生命叙事	郭 力	(403)
“脚踏两城”的民初文人		
——民初市民文学作家的文化姿态	刘铁群	(446)
另眼看丁玲	傅光明	(481)
“水晶鞋”的意义与“水晶鞋”的选择		
——学习“文学研究方法论引论”课程的感受	刘铁群	(493)
方法论中“文学身份”问题		
——谈谈“文学研究方法论引论”课中的一点体会	曹禧修	(497)
女性批评的意义阐释与话语实践	郭 力	(502)
成长的快乐(代跋)	刘思谦	(507)
后记		(512)

学术与良知

——《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序

耿占春

刘思谦老师要我为这本书写点想法，想到她我就想到了这个词：学术良知。尽管这里不可能主要谈论这个问题。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刘老师的文字，是一篇贴在文科楼走廊内的“公开信”，批评一个可能还深受“文革”极左思想遗风影响的领导人物。那是1978年。也正因为这篇文字，我们这个学校的学生就没有能听到她讲的课程。在此后的岁月里，我读了她的专著和不少文章，一个明确的感觉是，人道主义和思想启蒙一直是她的整个学术生涯的支撑点，是她学术思想的底色，也是她整个学术研究的目的之所在。尽管二十多年了，理论界和批评界的新思潮新方法不断涌现，人文学者思想启蒙的使命也似乎正在宣告“终结”，但刘思谦老师似乎未曾改变过她的基本信念。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她对新知识的拒绝或漠不关心，相反，她非常注重吸纳新知以充实人本主义的内涵，以焕发思想启蒙的活力。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书说明了这一点。这本书是刘思谦老师给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研究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的纪录。课程论述对象是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是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都比较热门的课题。课程的内容涉及叙事学、解释学、原型批评、结构和解构批评（尽管刘老师似乎一点都不认同它）、女性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等等，几乎囊括了从20世纪初的形式主义的文

本分析到世纪末的对社会历史批评的重新综合。

刘思谦老师专治文学史,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专注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通过这门课程,她把研究领域和学术视野再次拓宽,显示了一个学人对知识的不知疲倦的探求。这种精神使思谦老师的学术思想充满内在的论争,也充满活力。令人感兴趣的还有刘思谦老师为这门课程所设计的教学“方法”。教课采用了对话形式,她先确定话题,推荐出阅读书目,然后让博士研究生们阅读、思考和准备发言稿。在正式座谈和笔谈以前,她要询问每个人的谈话主题和想法。而研究生们要看的书,她都要同时加以研读。在对研究的问题有较充分的准备之后进行讨论。这种方式要求研究生们不仅要读要想,还要写,以提高他们的研究能力。她的教学方式是很有启发性的。自然,这个过程使课程延时很长,本书记录的谈话时间从1999年到现在。去年我和张清民来河南大学后,曾应约参加过这个系列中的最后两次讨论,得以感受思谦老师自己所说并且加以实践的教学相长的授课方法。

对话或者交谈是中西哲人早期的授课形式和写作的文本形式,在今天看来,对话与交谈主要还体现为一种思想方法,对话性应该体现为思想的动态过程。对话与交谈表达的主要不是某些思想结论,而是思想表达的现场,是思想交流和互动的场所。刘思谦老师在这门课程中所做的就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还有更主要的,是她提供和创造了一个激发思想和交流的现场。在一个相对来说在学术和思想上都交流不够充分的地方大学环境中,这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思想的对话有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甚至是生存环境。

在此系列讨论中,除刘老师和博士生们的对话这层意思之外,还有她通过阅读与表达,和更大范围内学者们的对话。可以看到,她除了阅读经典的理论与作品,也大量阅读同行们的著作,在这些谈话中思谦老师经常认真而富有激情地评述许多年轻学者的文章

与观点。或赞赏或批评,都表现了她惯有的真诚。这一点对我富有启发:应该更多地阅读当代人的著述,形成更有效的和好的思想对话性。

这个讨论从方法论问题开始,后面回到了意义阐释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回到了刘思谦老师一直关心的个人主体性和个体生命价值问题,历史境遇中的个人生存问题,尤其是更易于受到个体伤害和结构性漠视的女性生存问题。这样一个学术讨论的进路表现了思谦老师的思想底蕴,它不仅表达了一种专业意识和专业需要,更是一个超越专业的良知体现。关心人,关心个人,关心脆弱而易受伤害的个人,在这其中,她之所以更加关注女性、女性写作(表达)和女性理论,不仅仅因为她身为女性,也不是因为她是女性主义者,而可能是因为除了女性是历史中最脆弱的个人,还可能是因为女性意识相对于压迫与权力来说,是一种最敏锐的批评意识。她的思考、教学与研究活动虽然总不过是在学院之内,但她所坚守的人本主义的价值理想,总会通过某些方式散播开来,给那些无助的个人以精神上的援手。不论效果如何,只有心存这种理念,文学研究才有继续下去的理由。无论如何,文学研究都不是一种封闭的理论与方法的实践。它总归是我们关心意义和价值问题的一条途径或一种方法。

如何综合

——文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之一

刘思谦 整理

自去年11月开始,我和河南大学中文系的三名博士生曹禧修、郭力、刘铁群共同研讨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个课题出现在我们对方法论的认识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中。过去总以为方法论相对于本体论和认识论而言,毕竟是次要的,不过是到达目的的手段,是过河的桥或船而已。在反复的文学研究实践中,我们才渐渐认识到,对于文学研究这样一种个体性的复杂艰难的精神劳动而言,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是很难也无须区分出什么本末、主次的,它们之间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桥和船的功能固然是过河,可是过河的人如果没有这桥或船,过河的目的也是空谈。所以这类过河重要还是桥重要的问题,实在是一个无事生非的伪问题。何况自80年代以来从西方译介过来的各种频繁更替的不同的批评流派的方法论,在我国90年代这同一时间平面上横向林立,再加上我们比较习惯的社会学批评和历史—美学的批评,摘其要者也有十来种,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自觉的文学研究方法论意识,对于一个以文学研究为业的人来说,就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了。进而言之,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文学,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文学批评方法论,倘若没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不善于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和方法论上下一番苦功夫并做出自主选择 and 决断,几乎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现在的问题是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桥或船摆在那里等着我们。任何一种文学批评方法论的理论合理性与可操作性,相对于无比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课题来说,都只具有一个方面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新潮迭起的20世纪西方文论,其后起的一派总是要以反拨前一派来确立自己的合理性,并且常常要把自己这有限的合理的一面发展到极端,结果常常是因极端而走向反面,失去了原来的那一点合理性。我们大可不必去重复这个悖论,因为时间已经为我们拉开了距离,让我们有可能一视同仁地根据自己论题的需要综合运用各家各派之优长而避其短,在社会中心、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读者中心这四者所缺失的维度的交叉点上起步。《文艺评论》1999年第4期陈剑晖的论文认为21世纪文学批评发展的方向是综合,并且对如何综合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尤其是指出综合与强化主体意识的关系,指出文学研究必须构筑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文学理论研究系统,摈弃以往那种见物不见人的机械反映论的方法论,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和认同。只有一点我们有所保留,便是建立一种整合的批评范式问题。陈剑晖先生认为,“整合也就是一体化,即努力去寻找或创造一套批评的‘超语言’,批评家凭借这套超语言式的总体理论,可以解释所有的文学现象。”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能解释所有文学现象的批评范式,几乎是不可能的,或是说是“难于上青天”。这也是我们只说“综合”而不说“整合”的原因。而“综合”总是具体的、千差万别的,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

事实上90年代文学研究已经在走向综合,尤其是90年代的最后一年间的文学研究,已经远远地超越了80年代中期“新方法热”的幼稚与浮躁,在中青年学者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论著,在如何综合的问题上给我们以许多有益的启示。因此,我们把研讨方法论的方法,定在具体地和深入地研讨一些研究论著的方法论上。整个研讨分四个专题进行,围绕着一些选定的论著从方法论

的意义上阅读和讨论。我负责的这个专题从十来部(篇)论著中选择了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葛红兵的《世纪末中国审美处境——晚生代写作论纲》,都是20世纪最后一年的后半年才出版和发表的新作。

下面便是我们对这两部研究专著的研讨情况。

艰苦的创造性综合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刘思谦:从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学》提出“重写文学史”这个话题,到1999年9月这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出版,历时十年有余。十年辛苦不寻常。这是一个长时间的渐进的阅读、梳理、发现、积累和思考的过程。陈思和在这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如《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整体观》、《民间的沉浮》、《共名与无名》等记录了这个不寻常的艰苦的创造性思维轨迹。从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由朦胧的萌芽状态到逐渐完整、系统和接近成熟的过程,我从中体会最深的是方法论变革与文学史观念、思维方式变革的内在联系。在这三者的前面,还应该加上对大量作品和翔实史料的认真阅读和分析,这应该是任何一种严肃的文学研究的实证性前提。这本《教程》我认真地逐章逐节地读了两遍,从其文字背后,认识到这四个环节之间的相互渗透、适应和促进的互动关系,否则便很难达到全书在叙述视角、历史框架、文本阐释乃至基本概念体系的内在统一性。整体的、多元的、开放的这三点,既是《教程》的文学史观,也是思维方式、也是方法论,由此才带来了这部文学研究专著较高的学术品格。作为一名教了20年当代文学史的教师,我在阅读中身不由己地要进行今昔对比,深深感到《教程》的出版,使过去那种陈旧乏味的、不说千篇一

律至少也是大同小异的文学史教材再也不能继续用下去了。

曹禧修:我感到陈思和对待 20 世纪西方的各种批评方法采取了“我注六经”而不是“六经注我”的态度。在《教程》所规定的整体文学史的框架中,始终保持了研究主体对方法的选择自由。这种为我所用的择取原则使《教程》很自然地逃脱了某家某派批评方法的局限。如果我们细心一点的话,20 世纪西方各种批评方法在《教程》中都可以找到踪迹,从批评视角、思维方式、操作程式到概念术语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只是他用得恰到好处,毫无生硬牵强甚至削足适履之弊。如第三章对《百合花》一文的分析,就综合运用了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方式、女性主义批评的性别视角和叙述学的结构分析等方法。而这一切,又都是为了更好地阐释小通讯员和新媳妇这两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在文本、作者、读者和客观世界四大批评要素中,《教程》编著者没有像西方批评家那样只采取单一的批评视点,而是把文本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综合考察作家创作的主观态度与现实环境,同时也不回避研究者主体感情的投入。这种以作品为主型,同时综合考察文本、作家、读者与客观现实的方法,使《教程》在承认和维护作品的文学性的前提下达到了多重视角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彼此间水乳交融。

郭力:我 1989 年硕士毕业后在大学教了十年的当代文学史,深深感到教材的政治化和思维方式、文学史观念的陈旧,目前大部分的教材体例还是以史带作品,而“史”又是被政治化了的国家主流话语,和作品之间有互鉴性,成为这种意识形态化了的“史”的附庸,千篇一律。真正的当代文学史不可能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陈思和主编的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其思想的起点便是对这样的文学史的怀疑。以怀疑为起点经过认真反思,总结前人和同代人的经验教训,终于拿出了这本高水平的当代文学史,我在阅读中有一种面目一新的感觉。另外,这是一本“以文学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那么对于长达半个世纪的当代文学作品必须有所

取舍有所梳理。陈思和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发现和选择了许多被以往的当代文学史排除在视野之外的在那时不可能发表的好作品，并把它们与当时公开发表的作品放在一起，梳理出“国家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民间意识形态”三种话语形式，突出了同一个历史时期文学创作共时性的多元性，丰富了文学史的空间。在这三种形式中，陈思和更多强调的是民间话语，认为这往往是知识分子在强大的主流话语中个人独立意识的曲折表达。

刘思谦：这是一种很有见地的也很机智的表述，我感到这是陈思和发现了处于思想高压之下而又不愿放弃思想独立、精神自由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所可能找到的迂回空间，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以叫做无奈的话语策略。可以设想，研究者如果是放弃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和价值立场，没有古人所说的那种设身处地“遥想人情”的人文情怀，那是不可思议的。第二章“来自民间的土地之歌”，我读来倍感亲切，感慨良多。同是对《山乡巨变》、《三里湾》、《李双双小传》、《锻炼锻炼》等小说的再认识再阐释，我写于1982年的论文《对建国以来农村题材小说的再认识》显得苍白无力、相形见绌。我写这篇论文的初衷，是认为这批作品仍有其文学史价值，不应该因为农村政策的变动而否定它们，认为这其实仍然是一种惟政治论的标准。应该说这个起点是对的，但是我却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后来终于从恩格斯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受到启发，抓住了“历史的真实”这个至今也说不清楚的无底洞来为这些作品辩护，“历史真实”在我的分析中变成了绝对理念，变成了黑格尔老人的“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当时我还不可能具备哪怕是朦胧的方法论意识，更不可能找到“民间”这个有生命力的分析范畴，在文学观上和方法论上其实仍然是反映论在起作用。《教程》中这一章以“民间”作为分析范畴，具体地和有说服力地分析了作家在当时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两种身份（国家意志的体现者、宣传者和民间文化爱好者、民间代言人）之间的契合与矛盾，分析了

不同的作品的民间文化形态倾斜的不同情况,从而具体地阐释了这些作品的艺术真实性和文学史价值。而且,编写者根据不同作家、作品的不同情况,灵活运用不同的批评方法,使同一个历史时期而且是相同题材的作品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精神现象。

刘铁群:这部“以文学作品为主型”的当代文学史,着重于文学史上重要的创作现象的介绍和作品艺术内涵的阐发。编写者在对文本进行选择与解读时,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内在价值标准,即努力剥离作品中的政治宣传因素,寻找出自民间的艺术魅力,努力辨别出大合唱中发出的个人的声音,探索和体现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第八章《对时代的多层面反应》中,以三类作家对时代的不同感受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多层面的文学,打破了传统的一元的文学史视角,像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这类在当时根本无法发表的作品才得以进入文学史的叙述体系,也使知识分子多层面的精神世界得以凸现,并有力地说明了“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精神传统在受到冲击压抑后并没有自行消失,而是隐蔽而顽强地存在着。显然,正是这一内在标准反映了编写者独立的价值取向和人文主义立场。《教程》综合运用了多种批评方法,尤其体现在文本内涵的阐释中,常常由于视角的新颖独到而阐释出文本内涵中的新意。我特别欣赏第六章对田汉的历史剧《关汉卿》的阐释。编写者从象征意义入手,在作品中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呼应,指出关汉卿不是一个现实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人物,他象征的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指出这部历史剧实际上寄托了老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自我形象、自我认同和自我定位。通过这种解读,在时代共名的文化规范之下,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得以呈现。

郭力:我以为可以说《教程》是多种批评方法的创造性综合。仅仅在文本解读方面就可以发现许多例子,如对翟永明诗歌的分析引入了女性主义批评方法,而对朱苏进的《绝望中诞生》则侧重于精神与心理分析,对《马桥词典》、《九月寓言》则是从文化视角

批评。与刘铁群所举的《关汉卿》相近的是对《燕山夜话》的重评。我给学生讲这个作品时,所用的文学史教材只说这个作品的思想性、知识性、针对性等等,不对作者的精神历程做出评述。《教程》则着重分析邓拓的“书生气质”,指出他的成长背景是受到历史文化精神的熏陶,他的个人价值与理想主义的人世精神传统紧密相连,因而才能有《燕山夜话》思想的尖锐性。这种分析,是运用任何一种单一的批评方法所难达到的。

刘思谦:《教程》的综合性创造思维更体现在他所引进的几个新概念上。新的文学史观念、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必然要求一套相应的概念体系来表述。过去那种政治化的和一元化的文学史,其概念体系也是贫乏混乱和苍白的,许多概念已经能指与所指脱离,成为飘浮在空中的失去了涵盖力与阐释力的空洞能指。《教程》对新概念的寻找是编写者文学史观念和思维方式、方法论变革的重要一步,陈思和把它们称做“关键词”,每一个关键词便是一个新的视域新的阐释空间和新的分析范畴,使编著者整体的、多元的、开放的文学史观得以在语言的层面上得到体现,使那些被权力话语所压抑和湮没的声音名正言顺地进入了文学史的叙述。“多层面”、“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理想主义”、“共名与无名”这六个概念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说明、相互补充的关系,其中比较成熟和完善、涵盖力和阐释力较强的,我以为是“多层面”、“潜在写作”和“民间隐形结构”这三个。

曹禧修:《教程》所提供的几个关键词,我们已经不能把它们单纯地视做几个有生命力的概念,结合陈思和本人近年来的有关著述,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已经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一个新概念体系,尽管这里的有些概念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例如其中的“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事实上是为当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思维与阐释的空间,其涵盖与阐释力已为《教程》中许多具体的文本解读所证实。有待完善的概念我以为是“民间理想主

义”、“共名与无名”这两个。

刘思谦：我也有同感。“民间理想主义”内涵比较模糊，其涵盖力也有限。编著者引入这个概念的初衷是对应于五六十年代那种意识形态化的虚伪的理想主义。但在八九十年代如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显然不仅仅是张承志和张炜小说中的理想主义，更为普遍的乡土文学、都市文学中有没有一种新的正处于萌芽状态的理想主义？我个人的感觉是肯定的。而且，张承志与张炜的理想主义很不一样，把他们拢到“民间理想主义”这个概念中去也不够贴切。“共名与无名”这一对概念，我理解是对那种大一统的一元化的文化形态瓦解后的一种描述。但“无名”是“共名”瓦解后的一种过渡状态，事实上与“共名”状态不处在共时态之中。曾经有过“主旋律”，“现实主义新写作”等等倡导，但并不成功，有的作品在当时就形同泡沫，被有的论者称为“泡沫文学”，说明“共名”的瓦解已成定局。“共名”之后是什么？无以名之，但我觉得对这无以名之的状态的一种命名值得重视，那便是“个人化”，而“个人化”其实是“共名”瓦解之后的必然。作为文学史著作，我觉得还是应该对这种规律性现象予以足够的重视。

刘铁群：《教程》所引进的新概念体系显示了编著者思维方式与观念的更新。但在使用这些概念时，一些习惯的文学史话语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整，如《教程》多次提到“五四”文化传统的复活或复苏。僵死/复活、沉睡/复苏都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事实上在《教程》对“多层次”、“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等概念的阐释时，已经有说服力地证明“五四”文化传统并没有僵死或被消灭，也不是处于沉睡、麻木状态，而只是从公开出版的报纸、刊物、书籍中退出，转到了边缘、民间乃至地下的私人领域，以书信、日记、随笔等个人话语形式隐蔽地和顽强地存在着，如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等事实上使“五四”新文化传统在黑暗专制的时代延续了一线火种。因此，“复活”“复苏”这类话语与引入的新概念

体系在思维方式上是有冲突的。另外,陈思和敏锐地指出,在战争文化心态支配下的文学观念给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带来了深刻影响,如用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构思作品,自觉不自觉地和平时期运用一些战争术语,这一论点很有说服力。但是在《教程》中也出现了诸如“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五四”新文化“辉煌的战斗”、知识分子参与现实的“武器”等颇具战争文化心态的叙述话语,似乎编著者也没有完全摆脱战争文化规范遗留下来的心理痕迹。

刘思谦:我在阅读中也发现了这一点,感觉有些扎眼,好像眼睛里揉进了几小粒沙子。这说明文学史观念、思维方式、方法论与语言变革的不同步性,说明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变革完全进入语言层面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很难一蹴而就。

曹禧修: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些新概念的使用大部分集中在《教程》的前九章,而且由于这些新概念的使用,使1949—1978年的文学史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重写与刷新。相比之下,十至二十章的写作则缺乏创造性。“潜在写作”、“民间隐性结构”等关键词在这几章里似乎失去了阐释空间。实际上,尤其是在80年代中后期以后,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形态这三者之间的距离仍然存在,这三种文化形态仍然程度不同深浅不一地对每一位作家发生作用,可惜编著者未能下功夫去挖掘。不过,这里也许有一些可以理解的难言的苦衷。

郭力:我还感到这本给本科生用的文学史教材是否有些偏深?文字也有些过于凝重。陈思和发表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的论文,题目中有“初级”二字,即《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级教程绪论》,不知是否由于这个原因而拿掉了“初级”二字?

1999年12月10日—2000年1月5日于开封